

是“丛林强盗”还是“民族英雄”？

——解读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真史》

彭青龙

内容提要 本文从《“凯利帮”真史》独特的叙事策略入手，结合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解读“凯利帮”与大英殖民者之间“硬权力”斗争的深层含义。通过分析这种权力的消解与转换，揭示叙事文本所彰显的政治隐喻，从而重新书写被殖民帝国所歪曲的澳大利亚民族史和文化身份。

关键词 彼得·凯里 “凯利帮” 历史 话语 权力 身份

发表于2000年并荣获次年度英国文学最高奖——布克奖的历史题材小说《“凯利帮”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是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Peter Carey）在世纪之交的又一经典力作。“该小说通过一个备受诋毁和磨难的声音，来讲述一个澳大利亚早期开拓者的动人故事。”^①这部重新审视爱尔兰后裔在澳洲受苦受难史的小说，一反澳大利亚社会以往按官方定论把内德·凯利描写成一个暴徒、盗贼和杀人犯的做法，而把他刻画成一个民族英雄，^②一个敢于反对殖民压迫的自由斗士。

《“凯利帮”真史》是根据澳大利亚殖民时期的“历史记忆”——墨尔本公共图书馆的13卷有关内德·凯利的“历史档案”——对逝去的殖民主义历史所作的全新的阐释。彼得·凯里在进入新世纪之际出版这部具有

“颠覆”意义的新作，绝不是让人们仅仅重温一下澳大利亚历史上“丛林汉”的故事，而是赋予它重写澳大利亚民族文化身份的哲理意义。当记者采访身居纽约的彼得·凯里的时候，他说撰写《“凯利帮”真史》花了他35年的时间，小说的主人公内德·凯利是澳大利亚的“托马斯·杰斐逊”。^③此言一出，立刻招来各方非议，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界定澳大利亚历史上“造反者”——爱德华·（内德）凯利——的文化身份，但其实质是如何阐释“大历史”，如何对待民族的“历史记忆”。《“凯利帮”真史》的文本充满了控制与反控制，压迫与反压迫，颠覆与反颠覆的冲突与斗争。透视叙事的表层，我们可以看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此起彼伏的权力消解与转换，从而揭示“硬权力”与“软实力”之间的话语斗争模式。而这正对应了新

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表层”和“深层”范式。“反历史”、“反殖民”、重新“书写”身份是《“凯利帮”真史》的真实“语境”。本文拟以彼得·凯里的独特文本叙述为切入点，从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解读《“凯利帮”真史》所彰显的政治隐喻，重新书写被殖民帝国所歪曲的澳大利亚民族史和文化身份。

历史语境

20世纪80年代，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注重文化审理的新的“历史诗学”登上了当代的文学论坛。在新历史主义看来，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了现实生活的一个政治隐喻。历史语境使文本构成了既连续又断裂的感觉和反思的空间。新历史主义不再重视所谓的正史、大事件、领袖人物的叙事，而是通过一些零碎的趣闻轶事，小人物的遭遇、插曲，去修正、改写在特定的语境中居支配地位的文化代码。

在殖民地区，处于支配地位的帝国文化代码起到了维系殖民形象、掩盖殖民过程所带来的苦难以及持续同化被支配者意识的作用。艾勒克·博埃默指出：“帝国的文本暗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个建立在数百万生命代价之上的世界体系，是怎样凭借着神话形象使自己合法化，而同时又把其中所包含的苦难掩盖起来。所以关于殖民活动的文字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它揭示了那个世界体系如何把其他民族的沦落视为当然，视为该民族与生俱来的堕落而野蛮的状态的一部分。但由于一切都归于僵化的类型定势，对于本土人的描述往往就掩盖了他们的动因、多样性，他们的抵制、想法和声音。”^①

彼得·凯里笔下的《“凯利帮”真史》是力图打破帝国文化代码的又一种尝试。小说

虽然没有描写澳大利亚土著人在英帝国建立殖民地期间所遭受的屠杀、奴役的惨状，但它通过主人公内德·凯利这个无权无势的个体，尤其是其作为历史“小人物”的不幸遭遇，再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东北部内陆地区几乎无处不在的贫穷和艰难，腐败与不公。内德·凯利诞生在一个穷苦的爱尔兰移民家庭，12岁那年，他的父亲被警察迫害致死，从此，他和母亲爱伦挑起了养活六口之家的重担。但殖民初期的澳大利亚天灾人祸不断，生活十分艰苦，再加上整个社会不公，乡绅恶霸当道，凯利一家挣扎在死亡线上。15岁的时候，他被指控协助丛林大盗劫劫而蹲了监狱。从此，凯利少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因不堪忍受警察费茨·帕特里克对母亲和妹妹的侮辱而开枪把他打伤。费茨·帕特里克无中生有，编造证据，向凯利一家疯狂报复。为救被捕入狱的母亲，内德·凯利铤而走险，揭竿而起，率领众兄弟，在苍茫的丛林里和警察、暗探、奸细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他们多次抢劫银行，并把抢来的钱分给像他一样的穷人，因而得道多助，深受丛林人的拥戴。“凯利帮”因人出卖而遭到警察的伏击，全部战死。内德·凯利因伤被捕，并于1880年11月11日被当局处以绞刑。

彼得·凯里是小说界的掘宝高手。《纽约时报》在评价《“凯利帮”真史》时，引用了文学评论家安东尼·奎因（Anthony Quinn）的一段话：“彼得·凯里无疑是小说宝库伟大的探索者之一……他将瑰丽的色彩、耀眼的光芒，赋予一个早已褪色的故事；将滚烫的血，温暖的肉赋予一个久远的神话。”^②凯里善于挖掘历史的宝藏，他最优秀的作品融合了维多利亚的宏伟气势与澳大利业的乡土气息。从《魔术师》（*Illyuhacker*, 1985）里那荒诞不经的139岁的流放犯，到《奥斯卡和

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 1988)^①里充满喜剧色彩的赌徒和玻璃教堂；从《杰克·迈哥斯》(Jack Maggs, 1997)里狄更斯式的伦敦高雅与粗俗并存的生活，到《“凯利帮”真史》里澳洲内地罗宾汉式的冒险生涯，他的作品无不表现出高超的创造小说氛围的能力。读者看到的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品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幻想与现实、怪离与真切、严肃与嬉闹、嘲讽但又不失宽容。正是凭藉这样的艺术特质，《“凯利帮”真史》以全新的视角，独特的叙事，人性化的刻画，来解构被官方肆意歪曲的“历史档案”，消解片面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记忆”，从而达到改写帝国代码、恢复历史“真面目”的目的。

小说以内德·凯利写给他未曾谋面的女儿的13封信为线索，讲述了主人公25年间的生活历程。小说除了在开篇和结尾处，各有一篇第三人称的叙述外，其余的13章节的“正文”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策略，以增加文本的亲切感和真实感。“我12岁丧父，知道我将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和沉默的世界里。亲爱的女儿，你现在也许还不明白我所说的话，但这个历史是为你写的。信中内容无一丁点谎言，否则让我遭受地狱之灾。”^②小说一开头就奠定了一种灰色暗淡的基调。充满“谎言和沉默”的话语世界背景，使内德·凯利所处的社会环境异常险恶，而主人公在信的开头就言之凿凿地强调所叙述内容的“真实”，这强烈地暗示了帝国文化代码的虚假性。

凯利从小就是一个善良、正直和勇敢的孩子，一个同学溺水，他不惜冒死相救。当落水儿童的父亲赠给他刻着感激之语的孔雀绿腰带时，凯利感到“爱搵奈尔的新教徒们见识了一个爱尔兰男孩的优秀品质，这是我早年生活的伟大时刻。”^③这样一位“根红苗正”的孩子最终却被代表着国家机器的腐败

警察、乡绅逼上了造反之路。但即使遭到警察的追杀，他也表现出非常人性化的一面，甚至冒着自己被人发现的危险，去帮助将死去的警察：“我走过去想使他舒适一些，但死亡总是痛苦的……我告诉他说很抱歉，非常抱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知道这一点。”^④

《“凯利帮”真史》似乎在向读者表明，内德·凯利是被大英帝国无数邪恶的仆从逼上“造反”道路的。凯利并不想偷马，但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他也不想杀人，但却不断受到警察的恶意伤害，不得不铤而走险。当凯利事后回忆在河边的血腥伏击时，他把它描写为“恐怖的一天”，“我的全身都为死亡而伤痛”。^⑤作者用这些语言来表示凯利的懊悔，也让读者感受到了凯利的血肉情怀。这种对主人公极具人性化的塑造，从根本上戳穿了内德·凯利是一个“爱尔兰疯子”，一个“旷古未有的恶魔”^⑥的谎言。

为了使人们相信这是“凯利帮”真实的历史，作者除了在人物刻画、情节设计方面“求真务实”外，还对小说的编排、印刷做了相应的处理，以增加小说叙述的可信度。如小说的开篇前附有一张内德·凯利家族居住和活动的平面地图，一份“墨尔本公共图书馆”收藏凯利手稿的报告和小说结尾处有关“凯利帮”全军覆没的报道。小说每一章的正文前都有一个主人公“断代史”的梗概。每一章的标题下还附有几行关于该“卷宗”外观情况的描述。如第一包“卷宗”是这样写的：“国家银行信笺，几乎肯定是1878年12月从国家银行欧罗拉支行拿走的。45页中号纸（大约8英寸×10英寸），靠近信笺顶端，有胡乱装订的孔眼，信笺粘满了泥土。”^⑦所有这一切体现了作者巧妙的构思和精心的安排。文献是虚构的，现实也没有“墨尔本公共图书馆”，但内德·凯利抗议大英帝国的怒吼声确实是真实的。

语言是历史的载体，也是个体文化身份的标识。彼得·凯里一反多年来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的华美与考究，通篇使用文化程度很低的、最朴实的劳动者的语言，初看起来，它像西方大城市地铁里的涂鸦一样混乱、不合语法。整个小说用的标点符号不多，通常一段只用一个句号。时态、语态常常颠倒，缩写、简写到处都是，这种凌乱无序和不符合规则的叙述一方面与叙述者的教养和身份相吻合，另一方面也仿佛使读者感受到了社会的无序和黑暗。

权力话语

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必须放回到历史语境中，也需要放回到“权力话语”的结构中去。福柯以权力理论对整个社会的文化进程加以独特的探讨并区分了“硬权力”和“软权力”两个侧面。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个网络关系。统治者利用这个网络并借助一定的机制和策略对社会进行各个层面的控制，即实施权力运作。权力的策略产生了知识。知识和权力融合在一起，使得统治的结构获取合法性。^⑭他指出，权力是档案的负面的社会政治现实，是一种无所不在、无以摆脱的社会罪恶。权力总是与知识携手并进，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权力和知识是一对共生体，其表象是知识，实质是权力。权力实施的核心是圆形监狱的“中央监视点”，这种圆形监狱的监视方式延伸出清晰的视觉系统，启示了现代传媒，使之同样具有将一切隐私和秘密完全暴露出来加以清晰地看与被看的可能性。因此，“凝视”就是一种话语，一种压抑，一种权力控制的象征。^⑮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家安东尼·葛兰西在洞悉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认同”作为权力的两种方式以后，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概念。“统治”是通过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实现

的，而“认同”是一种隐蔽的权力关系。领导权是通过市民社会的渠道，使人们形成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甚至在文化观和价值论上达到整合，统一在某种意识形态中。事实上，“领导权”的实施不断由军事和政治冲突转化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磨擦，并通过其舆论宣传、知识的传播，使其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统治合法化。^⑯帝国主义在殖民时期的统治往往是“多管”齐下，既有强制性的武力压服形式，也有非暴力的怀柔手段。既有物质控制和剥削，也有思想意识等的精神奴化。

《“凯利帮”真史》历史语境的表层是一个“造反英雄”的血泪史，其文本充满了与大英帝国殖民统治者的血腥斗争。代表着帝国利益的牧场主、乡绅千方百计地霸占更多的公共土地，使穷苦百姓在经济上处于一贫如洗的地步。维护帝国统治的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和法院等则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政治上镇压穷苦人的反抗。并通过文化，即书籍、杂志、教会和传媒，来控制 and 操纵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词语、符号和情感。作者通过主人公内德·凯利愤怒控诉了大英帝国对被殖民者，尤其是对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的残酷压榨，强烈批评了英国殖民统治机构和司法制度的腐败、不公与虚伪。以费茨·帕特里克为典型代表的殖民警察，极尽欺压百姓之能事，对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区实行“白色恐怖”统治。他们为非作歹，玩弄妇女，罗织罪名，陷害无辜。不仅如此，他们还串通司法机关维护谎言，鼓励伪证以维护其虚伪凶残的统治。这个国家就是由狱吏看守着的一座大监狱，和过去相比，并没有更多的公平与自由。”^⑰

除了攫取物质财富外，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者还通过“监狱”这一“中央监控点”来监视和控制着被殖民者的“行动自由”和“言论自由”，并通过控制报刊杂志、书籍的

传播来达到控制他们的思想、意识的目的。从而使他们的声音不被公众所听见，他们的真实历史不为后代所知晓。1974年，茨维坦·托多洛夫在《征服美洲》一书中指出：“殖民压迫最重要的特点不是控制被殖民者的生命、财产乃至语言，而是控制传播工具。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其媒体，如报纸、电台、电视台掩盖其罪恶。”^⑩《“凯利帮”真史》也如是上演了一幕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话语权力”的斗争。

内德·凯利生活在“谎言和沉默”的世界里。当他还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的时侯，警察欧耐尔就对他编造谎言，说他父亲是一个屡教不改的流放犯，一个企图造反而后又出卖同伴的人，一个穿裙子的同性恋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诽谤就像养肝蛭一样在我心里越钻越深，越长越大。”^⑪“我因为一个秘密而失去了父亲，……我已无法把他放在他应有的位置。”^⑫

长大成人后，凯利更是谎言的直接受害者。大英帝国的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尤其是警察、监狱强制被殖民者保持“沉默”，剥夺他们的行动自由和话语权利。在“凯利帮”“造反”打死四个警察之后，殖民者通过《旗报》、《广而告之》、《守卫者》、《墨尔本先驱报》等报纸，编造大量的谎言以混淆是非，丑化“凯利帮”。“那篇文章的打字标题是：‘警察在桉树湾惨遭杀害。’……说我们是‘爱尔兰疯子’，说我把肯尼迪中尉大卸八块。说我打死他之前，割了他的耳朵。还说我强迫三个同伙朝警察的尸体开枪，让他们和我一起分担罪责。”^⑬

内德·凯利虽然读书不多，但他深知知识的力量和话语权的重要。当他从官方的报纸上看到许多歪曲事实的错误报道后，他感到非常愤怒。“《墨尔本守卫者》管我叫聪明的文盲。另一张报纸说我充满了病态的虚荣。我气坏了。这些满纸屁话的破报完全是

对正义的亵渎。比彻沃斯监狱就是整个殖民地的缩影。我把报纸扔到地上，使劲踩了几脚，要不是怕警察发现，真想朝那堆报纸开几枪。”^⑭但作为无权无势的个体，在强大的殖民统治者的舆论攻势面前，内德·凯利显得很无助，他的“话语权”被剥夺了，他成了一个会说话的“失语者”。内德·凯利绝望了，于是他决定抢劫一个印刷所，自己印传单。凯利找到《杰瑞尔德瑞报》的主编盖尔先生，希望他能帮他印刷他的“真史”，但盖尔和他老婆出卖了他，并把他历尽艰辛，在逃亡中写的手稿交给了警察。无奈之下，凯利在“电闪雷鸣的夜晚”又开始书写他的历史。“书写”是他同帝国殖民者之间的一场没有硝烟的“软权力”的斗争。

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真史》里描绘了大英帝国在澳大利亚殖民社会的权力网络体系。警察、监狱、司法机关、报纸、学校、印刷所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大网络。其中警察、监狱、司法机关是“硬权力”机关，报纸、学校、印刷所发挥着“软权力”的功能。殖民者一方面通过“硬权力”实施残暴统治，另一方面又利用“软权力”使其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以“凯利帮”为代表的被殖民者，既要同“表层”的“硬权力”作斗争，还要同“深层”的“软权力”较量。这种“权力话语”的消长和转换正是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真史》所要表现的深层“范式”。

文化身份

彼得·凯里说：“你总想探究澳大利亚的历史……因为你从那块土地上生长起来，你从流放、集中营、种族灭绝政策以及诸如此类的历史陈迹中走来。你的呼唤是一种失败的文化的回声。”^⑮《“凯利帮”真史》就是要通过其主人公内德·凯利来探究澳大利亚

民族曾经迷失的“根”和“文化身份”。

处于中心之外的“边缘”地带的殖民地，对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上的依赖，使其文化记忆深深打上了“臣属”的烙印。历史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过程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在宗主国的“凝视”之下，历史成为被看的景观，并在虚构和变形中构成“历史的虚假性”。^②大英帝国统治下的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历史，同样受到了中心话语“认知暴力”的强烈挤压。殖民者有关“凯利帮”的叙述充满了“历史的虚假性”。为重建真实的历史叙述，“凯利帮”同殖民者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正是在同“历史谎言”的斗争中，臣属的殖民色彩得以抹去，民族的“历史记忆”得以恢复，民族的文化身份得以重新书写。

《“凯利帮”真史》是“凯利帮”及其家族的血泪史，也是澳大利亚民族血泪史的缩影。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坚韧、反叛精神正是澳大利亚民族性格最耀眼的部分，从而为澳大利亚的民族发展史作了最充分、最合理的解释。

澳大利亚是基于“被迫流放和受监禁”基础上的一种创造。^③澳大利亚历史的第一页可以说是由流放犯揭开的。1783年美国脱离英国而宣布独立，致使英国不仅失去了一块殖民地，而且也丧失了对其至关重要的罪犯流放场所。数年后，英国的监狱人满为患。1786年英国政府不得不决定把探险家库克于1770年发现的澳洲大陆，辟为罪犯流放基地。翌年五月，澳大利亚首任总督菲利普率领二百多名官兵，押送750名男女流放犯，飘洋过海，于1788年1月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登陆。他们屠杀了在澳洲大陆上过着捕鱼狩猎原始生活的大部分居民，用血和火开辟了一条殖民主义的道路。流放制度始于1788年，在1840年至1868年间被陆续宣布取消。数十年间，先后共有168,000

名犯人从英国被放逐到澳大利亚，其中大多是刑事犯，也有一部分为政治犯，有的是从事议会改革活动者，有的是激进的工会主义者，还有一些是要求爱尔兰自治的活跃分子。^④

小说主人公内德·凯利的家族流淌着爱尔兰人“反权威”、“反压迫”的血液，这和整个澳大利亚民族反殖民，求平等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内德·凯利的父亲瑞德·凯利是个爱尔兰的流放犯，曾被关在范迪门监狱，在受尽磨难之后被当局释放。他于是渡海来到维多利亚殖民地，并发誓避免受到法律的“关注”。当他发现“墨尔本的街道的警察比苍蝇还多时，他步行28英里来到唐尼布鲁克小镇”，^⑤以求安宁。但这里的警察并没有给他清静之日。他再一次含冤被捕，并被警察迫害致死。其后，内德·凯利的叔父詹姆斯也没有逃脱被殖民当局绞死的命运，母亲和妹妹更是备受警察的羞辱。内德·凯利愤怒地写道：“当我们勇敢的父母像牙齿被强行拔掉一样离开爱尔兰的时候，他们的历史，所熟悉的一切都被迫丢弃在科克、盖尔韦和都柏林的码头上。”^⑥

历史上，爱尔兰曾是被英国占领的殖民地，饱尝被“边缘化”、被奴役的痛苦。在《“凯利帮”真史》里，爱尔兰裔澳大利亚人还要忍受历史断裂、身份丧失的苦难。小说在行文上散发出浓浓的爱尔兰文化的清香。爱尔兰的典故、婚礼风俗、幽默故事、宗教传说比比皆是。这既增加了文化的张力和蕴味，又使小说赋予很强的政治文化隐喻。在小说的第12章——打造盔甲中，作者着力渲染制造钢铁盔甲的过程和它的威力，目的是想锻造出“永远不会死的斗士”。^⑦内德·凯利的“打造盔甲”是受美国内战报道的鼓励和启发，“啊！人也可以把自己武装得像一艘战舰，一直打入比彻沃斯监狱和墨尔本监狱。他可以砸烂它的大门，推倒它的高

墙。没什么枪炮可以阻止它，撕裂他的皮肉，打碎他的头颅。就像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独身保卫祖国抵抗侵略者的英雄——伟大的库丘林。据说他的战车和他的身上都绑着锋利的铁矛和带钩的刀，还有铁圈和绳索。”^⑭穿着盔甲的内德·凯利没能创造不死的神话，但他赋予爱尔兰人的勇敢的自由斗士的精神却得到了永生。

即使在今天，内德·凯利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其中争议的焦点是他的社会革命的呼吁。正如英国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他1969年的经典著作《土匪》一书中告诉我们的，内德·凯利可以划归为社会土匪，是穷苦大众的复仇者。他和诸如美国的杰西·詹姆斯^⑮、墨西哥的潘寇·比亚^⑯和印度的佛兰·迪维^⑰相提并论。我们看到，在凯里的笔下，“凯利帮”确实有着明显的政治抱负。这表明“凯利帮”已经不是一个简单意义上的草莽英雄，而是一群具有反抗精神的澳大利亚民族的自由斗士。

化。”详见露丝·布朗：“英国遗产和澳大利亚文化”，《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卷17，1995年，第2期。

⑭ Peter Carey,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2000, p. 1, p. 34, p. 277, p. 278, p. 296, p. 3, p. 347, p. 11, p. 18, p. 5, p. 99, p. 373. 以上引文由笔者自译。

⑮ M. Foucault, *Power Knowledge*, ed. Colin Gordon,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0, p. 96.

⑯ M.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ed. and trans. by Colin Gordon, New York, 1989, p. 50.

⑰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 and trans. by Quinto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71, p. 62.

⑱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 79.

⑲⑳㉑㉒ 彼得·凯里《“凯利帮”真史》，李尧译，载《世界文学》2002年第4期，第10、63、6、10页。

㉓ G. C. Spivak, *In Other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 208, p. 267.

㉔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著《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6页。

㉕ 黄源深《澳大利亚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㉖ 杰西·詹姆斯（1847 - 1882）是美国西部地区著名土匪，从事抢劫银行和拦劫火车等犯罪活动，被人们称之为美国的“罗宾汉”。

㉗ 潘寇·比亚（1878 - 1923）墨西哥革命领袖，农民出身，率众起义，参加推翻 P. Diaz 独裁统治的斗争（1910 - 1911），后又领导游击队反对 Carranza 政权，直至将其推翻（1920）。

㉘ 佛兰·迪维（1963 - 2001）印度女匪首，出身卑微。1981年因策划“圣瓦伦廷节大屠杀”而闻名，两年后被捕入狱，1994年获释，并被选为议员。

① 这是2001年布克奖评委会主席肯尼斯·贝克对《“凯利帮”真史》的评语。详见 <http://contemporaryit.about.com/library/weekly/aa101801a.htm>。

② 澳大利亚曾是英国放逐犯人的殖民地，其早期的居民主要是受压迫的流放犯和为淘金而来澳洲的海外移民。为争取平等地位和自由身份，他们同殖民者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斗争。内德·凯利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他反对殖民压迫、杀富济贫的故事已成为澳大利亚的民族神话，其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

③ Robert Mccrum, *The Observer*, Sunday, January 7, 2001.

④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⑤ Anthony Quinn, “Robin Hood of the Outback”,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uary 7, 2001.

⑥ 《奥斯卡和露辛达》（*Oscar and Lucinda*）是彼得·凯里力图打破帝国文化代码的一次尝试，该小说于1988年获布克奖。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不是发现新的文化倾向，而是邀请人们重新审视一下旧文

[作者简介] 彭青龙，1967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外贸学院外语系副教授，近期论文有《从〈奥斯卡与露辛达〉到〈“凯利帮”真史〉——简评两获布克奖的澳大利亚作家彼得·凯里》等。

责任编辑：冯季庆